

外国文学史编纂史与时代变迁

韩 加 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以 1949 年以来国内出版的部分外国文学史教材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教材编写原则的演变，并进而思考外国文学史研究的变化。通过对相关教材的分析，本文总结出如下几个明显特点：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从禁区变为热点；无产阶级文学从正统到边缘或消失；从依赖导师语录到比较关注学术探讨；东方文学有从刻意突出到重新被边缘化的危险。这些变化反映了国际关系的变局以及我国社会的变迁，探讨这些变化有助于思考外国文学研究未来的发展。

关键词 外国文学史 欧美文学 亚非文学

外国文学史研究可以大致分为综合性外国文学史研究和国别文学史研究。国别文学史有为语言教学服务的外文本和面向研究者和大众读者的中文本两大类，外国文学史则主要是面向中文系学生的教材，虽然以大众读者和研究者为对象的多卷本外国文学史近年也不断出现。^① 本文以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出版的部分外国文学史教材为考察对象，探讨这些教材编写原则的演变及其原因。

一、早期尝试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最初十年，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从内容到方法都是按照苏联的模式进行的，教材主要用苏联教材的中文译本。50 年代正式出版的中国学者撰写的外国文学史专著只有冯至、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的《德国文学简史》。本文主要探讨综合性外国文学史，但《德国文学简史》作

^① 如吴元迈主编的十卷本《外国文学史话》和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等。

为新中国出版的第一部外国文学史著作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序”开头一段是这样写的：“这部《德国文学简史》是在党中央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一部分师生组成的‘德国文学史研究小组’在学校党委领导的科学研究大跃进运动中在短期间内集体编写的。”^①关于本书的编写过程，“序”中写道：“这部文学简史有的部分根据旧日的讲稿加以修改，有的是重新改写，尤其是近代和现代部分，过去是一片空白，完全是这次写出来的。”（《德》：1）本书编者的分工是：“从文学史的开始到1848年是由冯至编写的，其中启蒙运动时代和1830年到1848年这个阶段李淑参加了编写工作，并且作了补充；从1848年到1890年由田德望编写；从1890年到现代由孙凤城、张玉书、杜文堂合作写成的。”（《德》：1）虽然署名六位学者编著，冯先生自己撰写的内容约为全书的一半。

《德国文学简史》全书共五编，以社会历史形态划分为“封建社会时期的文学”（到15世纪为止）、“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文学”（16和17世纪）、“资本主义上升和发展时期的文学”（18世纪到19世纪晚期）、“帝国主义时期的文学”（1890年到二战结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民主德国文学）等。正文开篇的“绪言”阐明了编写原则：“首先在文学史里我们要充分地认识到德国人民各个时代里的阶级斗争在文学里的反映”（《德》：1）；“第二，每个国家的社会发展，有它自己的特殊情况，它常常给这个国家的文学以特殊的性质”（《德》：1—2）；“第三，在注意到社会发展中的特殊情况时，也应该认识到，德国文学在欧洲并不是孤立的，它经常受到国际上的文学潮流和其它国家的影响，同时也影响着其他的国家”（《德》：2）。以上三点可以说很鲜明地体现了当时外国文学史研究的特点，这就是以阶级斗争为文学发展的主线，强调社会历史条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在注意到各国特殊性的同时不忽视国际影响。此外还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第四，我们要防止一个可能发生的偏差。社会发展的历史对文学的演变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根据历史和时代背景来解释、分析文学，这是正确的，但不能喧宾夺主，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注解。我们同样应该注意的是作者的创造性、作品的艺术性”（《德》：2）；在那个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能够对文学作品的艺术性有如此清醒的认识是十分难得的；“最后，这部文学简史是为中国的读者写的。在我们写作过程中要贯彻厚今薄古、古为今用、外为中用的精神”（《德》：3），这

^① 冯至、田德望、张玉书、孙凤城、李淑、杜文堂编著《德国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1页。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一点是所有搞外国文学史研究的中国学者需要铭刻在心的。

在 1950 年代为什么只有《德国文学简史》出版呢？恐怕最主要的原因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均为德国人，他们（特别是恩格斯）在著作中对德国文学的发展和一些重要作品有过很多精辟论述，是中国学者讲述德国文学发展史可以依赖的权威。笔者统计了一下，从中世纪到 17 世纪结束的两编共有 15 条注释，除第一条引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第二条为对德国语言发展的介绍，其余 13 条皆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权威论述。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或总结文学发展史及其重要作家或作品是当时文学史研究的一大特色。在那个时代，俄苏文学是最受重视的外国文学，而美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对立面，其文学是不受重视的，偶尔提到也是做反面教材；英、法文学史讲述要以苏联学者的观点为准则；只有德国文学史因为有革命导师的论断在前，可以进行适当的讲述。海涅之所以被称为“德国 19 世纪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德》：235），是因为他在 1843 年结识马克思，成为忘年交，其后期创作深受革命导师的影响。到了 20 世纪，著名德国作家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还有戏剧大师布莱希特，都倾向于支持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20 世纪前半期的德国文学就是社会主义或民主主义文学与法西斯文学斗争的过程，而战后建立的民主德国自然成为除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文学基地。这种特殊性是其他任何大国文学所不具备的。

50 年代末中苏两党分歧日益严重，终于导致 60 年代初两党决裂；中苏两国从情同手足的盟友变为势不两立的死敌。一方面由于中苏交恶，另一方面也由于已经建国十年，有了独立进行研究的较好基础，于是，1961 年 6 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和高等教育部决定，联合组织编写全国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为主要领导者。^①《欧洲文学史》、《西方美学史》等影响了几代人的自编教材均出现在这一时期。尽管苏联模式的影响仍然存在，但毕竟是中国学者按照自己的需要，在自己的研究基础上编写的相关教材。根据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以北京大学杨周翰、吴达元和赵萝蕤先生为主编，负责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的编写，参加者除北大教师外还有北师大、北外、华中师院和当时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人员。

^① 关于欧洲文学史的编写和周扬的作用，详见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 年 第 382—383 页。

1962年《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提纲》“先行印出，征求各方面的意见”^①。《提纲》共344页，字数“约占文学史字数的三分之一”（《外》：1）。《提纲》“说明”指出：“根据欧洲文学本身的发展情况，也考虑到欧洲社会发展阶段的特点，把欧洲文学的历史分为八段：古希腊、罗马文学；中世纪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世纪文学；18世纪文学；19世纪文学（一）（1789—1830）；19世纪文学（二）（1831—1870）；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学（1871—1917）。”（《外》：1）从这个分期可以明显看出厚今薄古的特点。另外，以十月革命为下限，也显然是苏联影响的体现。《提纲》根据“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和当时的重大社会问题；是重要文学运动或文学流派的最突出代表；在世界或欧洲文学发展中有突出贡献或起了划时代的作用”三条标准，确定了七个重点作家：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歌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高尔基，并根据“广泛地反映了自己国家的社会情况；重要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对本国文学发展有重要贡献”等标准，选出了“二十几个次重点作家”（《外》：2）。

虽然《提纲》没有具体列举次重点作家，但从目录可以看出这个名单大致包括下列作家：拉伯雷、塞万提斯、弥尔顿、莫里哀、莱辛、席勒、拜伦、雪莱、雨果、普希金、密茨凯维支、狄更斯、海涅、果戈理、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裴多菲、易卜生、罗曼·罗兰等人。如果按今天比较普遍接受的标准来看，七个重点作家中似乎应该用塞万提斯取代高尔基；次重要作家的选择恐怕就更可议了。“说明”对于具体编写步骤做了如下表述：“我们力图从三方面叙述欧洲文学发展的线索：历史（包括经济发展、政治情况）、思潮（包括哲学思潮、社会学说等）和文学发展（流派的演变、前后关系和相互影响等）。每章的总概论企图从这三个方面将当时全欧的总情况概括叙述，也说明各国的同异；每章下，各国的概论这个国家在这一时期这三个方面发展的特点。”（《外》：2）杨周翰教授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发表的《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是关于文学史研究的重要论文。他在文章中写道：“把俄罗斯、苏联文学和西欧文学分讲，或者由于师资条件，或者由于其它原因，也未尝不可，而且相沿成习，有它方便的地方。但是作为一门学科，欧洲文学史大体上在十月革命以前似乎应作为一个整体考虑。”^②这可以说是委婉地批评1950年代受苏联影响而

^①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提纲》1962年，第1页。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杨周翰《欧洲文学史研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载《文学评论》1963年第1期，第99页。

在外国文学史教学中把俄苏文学单列，置于特别突出地位。

《欧洲文学史》上卷 196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包括绪言和古代文学、中古文学、文艺复兴时期文学、17世纪文学、18世纪文学共五章，总计20.8万字。“绪言”篇幅不长，分四节概述学习外国文学的意义、欧洲不同历史时期文学特点、欧洲文学史上的主要作家流派和学习欧洲文学史的思想方法等。关于本书的编写宗旨，“绪言”写道：“这本《欧洲文学史》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供有关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作为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并为进一步的研究打下一些基础。”^①在思想方法一节，强调“在学习时，有必要在思想上划清和资产阶级的界限，特别需要树立起批判的学习态度”；“具体说来，要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观点分析历史上的欧洲文学现象，例如，要分析它们是属于哪个阶级、哪个时代的；是人民的文学，还是统治阶级的文学；是阶级上升时期的，还是没落时期的”（《欧》：7）。“欧洲文学的范围很广，要注意部分和整体、点和面之间的关系”；“学习欧洲文学史，也需要运用联系、比较的方法”（《欧》：8）。各章第一节为概论，然后分节论述各个时期的主要文学发展状况，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分别介绍主要国别文学。虽然《欧洲文学史》上卷篇幅不长，涉及的内容又极多，但全书结构清晰，论述详略得当，语言流畅，言简意赅，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谈到本书的编写工作，孙凤城教授写道：《欧洲文学史》“上册写于困难时期刚过，处于相对稳定时期，定稿时主要由作为主编的几位老先生每天聚在一起，不论是对内容还是语言问题都是逐字逐句进行捉摸、再三推敲后才下笔。因而上册显示出来的特点是：资料扎实、确切，而观点比较平稳，文章十分简练。从史的发展看，显得清晰，观点也明确，作为教材，可以充分利用其资料，而其观点可以作为参考。这是一部在平稳环境下产生的文学史”^②。

《欧洲文学史》上卷出版以后受到热烈欢迎，孙遵斯在《文学评论》杂志撰写书评予以推荐：“这主要是为高等学校欧洲文学史课程的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教科书，但是，它作为一本文学史的一般读物，也是读者殷切期待的。这不仅因为它是解放后我们自己编写的第一本欧洲文学史的正式教科书，而且还因为它是近

①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第2页。后文出自该著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字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孙凤城《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收入李明滨、陈东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页。

年来第一本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努力贯彻批判继承的精神所编写出来的欧洲文学史专著。”^① 教科书和专著结合在一起是《欧洲文学史》上卷的突出特点，为后来的外国文学史编写树立了质量标杆。孙遵斯的书评谈到《欧洲文学史》上卷的优点，主要强调其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用阶级分析观点评论欧洲文学：“任何时代的文学都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现实生活的一种反映。《欧洲文学史》的编者努力紧扣着这一基本的关系，在叙述中总是把欧洲各时期、各民族、各流派放在和它们相应的社会现实生活的背景上，具体的阶级斗争情势和阶级关系中加以考察。”（《欧》：82）而对于《欧洲文学史》上卷的缺点，孙遵斯认为主要在于有时用抽象的人性论解释人物，“没有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举出一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谬论的对立面，进行分析与批判。不仅如此，《欧洲文学史》在对有些问题的提法和解释上，似乎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观点”（《欧》：86）。这种评判标准反映了1960年代的现实，我们没有必要求全责备。实际上，《欧洲文学史》上卷对于人性论问题还是很警惕的，比如在对18世纪英国小说家菲尔丁的总体评价中就有这样的话：“他的批判是从人性论、抽象道德观出发的，他的正面人物体现了这种观点。小说的大团圆结局也说明了这种思想的局限。”（《欧》：240）《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发表采访杨周翰教授的谈话，其中关于《欧洲文学史》的缺陷杨先生说道：“我指的是没有注意到文学本身的独立性。我们没有从文学传统的发展演变着眼。文学变成了阶级斗争的说明书，文学史成了历史的印证或材料汇编。这是最大的缺点。例如文学史的继承与革新问题，这是一个规律性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的文学史主要倾向是把一个时期的文学看成是对前一个时期的简单的否定，非常忽视继承的一面……其次……我们忽视了作家的头脑……另外我们更是忽视了艺术形式。”^② 把孙遵斯1964年在《文学评论》发表的书评与杨先生在文革后的反思相比较，不难看出时代的巨大差别。龚翰熊在《西方文学研究》一书中称这部《欧洲文学史》是文革前“中国西方文学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并指出其具有三个突出特点：有“全局性的文学史观”，“对各种思潮、作家与作品作了很有深度的分析”，“侧重深入发掘各种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注意清理由‘此’通向‘彼’的线索”。^③

① 孙遵斯《欧洲文学史》（上册）载《文学评论》1964年第2期，第82页。

② 《杨周翰教授答本刊记者问》载《外国文学研究》1980年第1期，第64页。

③ 详见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第383—387页。

石璞教授的《外国文学史讲义 欧美部分》1963年7月由四川大学出版，分上、下两册，共七章，涉及的重点作家有荷马、但丁、莎士比亚、莫里哀、歌德、席勒、拜伦、雪莱、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狄更斯、海涅、惠特曼、左拉、罗兰、易卜生等。与《欧洲文学史》相比，它不包括俄苏文学，但包括美国文学。“文革”后的198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以《欧美文学史》为书名正式出版，上卷四章570多页，下卷三章420多页。上、下卷都在正文后面有“附录：本书重要作家作品原文对照表”，表现了作者的严谨态度。石璞在“后记”中写道：“这一讲义在62至65年期间，除四川大学外，曾先后为黑龙江大学、武汉师院、西南师院、南充师院等高等院校所采用。认为它基本上体现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详略深浅，适合大专院校程度；史的发展，来龙去脉比较清楚；重点作品有较详细的艺术分析。”^①她还写道，许多同行“均认为我的60年代的讲义曾在外国文学教学上起过‘启蒙’作用，别具风格，现在仍然为好些同行所参考。在同志们的鼓励之下，特抽空将十余年来研究的成果加以充实和修改，交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②。不难看出，石璞教授是在欧美文学史研究方面较早做出贡献并有突出成就的人。

石璞的《欧美文学史》与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的最大区别是更适于教学。由于本书源自作者自己上课的讲义，结构安排按照教学要求分成若干单元，每一单元以某个作家的代表作品为中心组织教学，不求面面俱到，但求有所收获。比如，在目录中明确列出要详细讨论的20多种文学作品。这样做的结果是读者或学生能对一些代表性作品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留下较深刻的印象。而多个单位的学者合作的《欧洲文学史》则以全面介绍欧洲文学史发展为目的，力求既照顾重点又顾及全面。虽然它也提出了七个重点作家和二十多个次重点作家，对整个文学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显然是重点，而对于文学作品，即使是重点作品也仅能介绍梗概，具体分析有待于授课老师的发挥。余虹在《石璞：一个人的百年》中写道：“1980年当我第一次读到石璞先生的《欧美文学史》时，非常激动，因为此前的外国文学史著述十分稀缺，除了杨周翰等人主编的《欧洲文学史》外，别无系统完整的相关著述。《欧洲文学史》虽体大虑周，但只是一个详细的论纲，作为集体之著述它也太粗疏。相比之下，我更喜欢《欧美文学史》它的个人著述性与详实细微使我获益良多，尽管我不喜欢那些混杂其中的

① 石璞《欧美文学史》（下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423页。

② 石璞《欧美文学史》（下卷），第424页。

主义话语。在我的学术记忆中，《欧美文学史》始终是一个要不断返回的路口，因为它启示我在一个沉默的时代真诚说话是多么不易和重要。”^①冯至等编著的《德国文学简史》、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与石璞著《欧美文学史》可以说开创了外国文学史教材编撰的两种模式，前者重综合史论，作品介绍较简略，具有研究专著的特点；后者则以作家作品评析为主，教科书色彩更浓。正因为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各种外国文学史著作大多遵循石璞的《欧美文学史》的路子，概述作家创作之后重点讨论一部代表性作品。

二、改革时期外国文学史编写

《欧洲文学史》上卷于1964年出版，下卷于1965年编写完成，但由于1966年“文革”开始，下卷迟至1979年才得以出版。1979年版“出版说明”指出：“现在我们根据原稿，并征求了一部分单位和读者的意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和增补，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②由于上卷1964年就定稿出版，1979年版虽标明“修订本”，实际上对上卷的修订比较有限。笔者对1964年版和1979年版作了简单比较，发现篇幅从20.8万字变为22.7万字，也就是扩充了约十分之一。就“绪言”来看，从8页扩为9页；原版只有引自《毛泽东选集》的5条注释，修订本引自革命导师的语录达13条，除毛泽东语录增加为8条外，还有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和《列宁全集》的5条语录，表明受到“文革”影响，更加依赖革命导师语录来增加论断的权威性。《欧洲文学史》下卷的修订受“文革”左的影响更大，改动很多，但由于1965年编完却没有出版，现在我们无法对两个不同版本进行比较。曾参与1979版《欧洲文学史》修订的孙凤城教授写道：“因为下册的主要内容是19世纪的欧洲文学，因而涉及的所谓资本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修正主义观点更是俯拾即是。因而，在那时期，要出版这样一本书，在观点上必须要大力修改，否则不能适应潮流，因而下册就要打破上册的客观、平稳性。像唯美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这类流派，只能尽量一笔带过，由于既不能否认它们的存在，而一提到它们就应该批判，因而只能含糊其事，最多加几个批判词，而因为言不由衷常常显得有气无力。”^③修

① 余虹《石璞：一个人的百年》2007年12月7日发表于清华校友网。

②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主编《欧洲文学史》（上卷 修订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1页。

③ 孙凤城《浅谈〈新编欧洲文学史〉》，收入李明滨、陈东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第11—12页。

订《欧洲文学史》时吴达元先生已经去世，赵萝蕤先生没有参加，修订本是在杨周翰先生主持下完成的，他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主编。尽管由于“文革”刚过，思想解放才刚刚开始，各方面的束缚仍然存在，修订本《欧洲文学史》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这部《欧洲文学史》在1979年出版后还是引起极大反响，上、下卷一次各印9万册，成为那个时期高等学校欧洲文学史课的必读教材。可以这么说，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入学的最初几届中文和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都是通过这部《欧洲文学史》来了解西方文学世界的。

《欧洲文学史》在编写阶段曾暂名《外国文学史欧洲部分》，正式出版后一直用《欧洲文学史》这个书名，涉及的只是欧洲文学。涵盖东西方的外国文学史教材是从1970年代早期开始编写的，起初叫做《外国文学简编》，因为那时高等学校在中断数年之后开始恢复招生，需要相关教材。笔者查阅了北京大学图书馆藏1974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试用本，发现它的内容与1980年正式出版的教材区别很大，“文革”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试用本正文前面有三页革命导师语录：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语录各一则，第三页是毛泽东语录三条，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到无产阶级对文艺的态度和舆论的重要性。“前言”有7页，几乎就是一篇火药味十足的大批判文章，从批刘少奇、林彪到以周扬为代表的所谓资产阶级文艺黑线等。《外国文学简编》试用本有12章，第一章是文艺复兴和莎士比亚，而古希腊、罗马文学和中世纪文学则根本没有提及。第二章启蒙文学和歌德，第三章浪漫主义诗歌和拜伦，第四章前期批判现实主义和巴尔扎克，第五章后期批判现实主义和托尔斯泰，第六章美国批判现实主义和马克·吐温，第七章是巴黎公社和鲍狄埃，第八章苏联无产阶级文学和高尔基。如果说前八章的内容大致与我们现在通常强调的重点作家区别不大，那么后五章则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第九章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十章阿尔巴尼亚无产阶级文学和皮塔尔卡的《渔人之家》第十一章朝鲜无产阶级文学和赵基天，第十二章战斗的越南文学和素友，第十三章苏修文学及其鼻祖肖洛霍夫批判。由于“文革”时期阿尔巴尼亚、朝鲜和越南是我国仅有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所以这三国的文学得到特别重视，而苏联文学的标志肖洛霍夫则成了修正主义文学的鼻祖，是批判的对象。翻看全书，每章后面的注释几乎全是革命导师著作的内容，专业性的文学史研究著作没有涉及。对于文学作品的评论充满了空话套话，对作品缺陷的指责也很牵强。如对歌德的《浮士德》的评论指出“艺术上最大的缺陷有二：一是作品中的某些部分，运用了脱离现实的象征手法，

致使这些部分晦涩难懂；二是浮士德的形象到第二部分失于抽象化、概念化，因而大大损伤了这个形象的真实感人的力量”^①。这种现象虽然很荒唐，但毕竟是“文革”之后外国文学史教学研究重新开始的标志。

这部《外国文学简编》试用本后来经过多次修订，到1980年正式出版时署名朱维之、赵澧主编，内容仅限于欧美文学，而《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则在1983年出版，署名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就影响来说，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出版最早，影响最大。实际上，第一部以《外国文学史》为书名的教材是24院校编、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文学史：1980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三册。这部三卷本《外国文学史》只在80年代出版了一次，很快就被不久后出版的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1985）和朱维之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亚非部分）》（1988）所取代。表面上看，朱维之等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是《外国文学简编》的自然发展，两者从主编到撰稿人都区别不大，但是《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1985年出版之后，《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1986年就出修订版，目的在于把现代文学包括在内。《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后来都经过多次修订，从而形成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南开大学出版社的《外国文学史》两个系列并存的局面，是30年来最有影响的外国文学史教材。

在1980年代，除了上述使用较广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还有多种《外国文学教程》。广西人民出版社的《简明外国文学教程》和江西人民出版社的《外国文学简明教程》都在1982年出版，前者署名“13院校编”，共342页，后者为“湘赣豫鄂四省34院校编”，有524页。显然，两书都是为了应付教学需要而匆忙编写的。与24院校编的《外国文学史》一样，这些教材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之后没有再版。这三部外国文学史教材的集体署名带有那个时代的集体主义特征，而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即使由多所院校数十人编写的教材类著作也会标明主编的名字。王忠祥、宋寅展、彭端智主编的《外国文学教程》分上中下三册，1985年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三册合计1100多页，前两册论述西方文学，第三册论述东方文学，属于篇幅比较大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类似的外国文学教程后来还出版了许多种。1993年，郑克鲁受教育部委托主持修订外国文学教学大纲，此后他又主持编写了两卷本《外国文学史》。1999年5月由

^① 《外国文学简编》（试用教材），《外国文学简编》编写组，1974年（无出版社），第71页。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该教材的参编者除了 20 多所高等学校外国文学教师外，还有十多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国别文学研究人员，他们精通研究对象国的语言，能够广泛利用第一手外文资料。王忠祥和聂珍钊主编的四卷本《外国文学史》1999 年下半年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其“内容简介”说：“本书是外国文学史教材，也是一部外国文学史研究专著，可作高等学校外国文学史教材，也可供广大外国文学爱好者及研究工作者阅读参考。”由北京大学李赋宁教授任总主编，刘意青、罗经国、彭克巽、罗芃、孙凤城、沈石岩等六位教授任分卷主编的新编《欧洲文学史》三卷四册，在 1999 到 2001 年间出版。这部《欧洲文学史》的编写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从立项到完成历时近 10 年，“参加编写的作者达 90 人之多。除北大自身的教授学者外，加盟编写的还有全国十三四所院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包括港台和海外华人学者”^①。这部新编《欧洲文学史》出版之后得到广泛好评，获得“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被誉为“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②新世纪以来，前辈学者朱维之领衔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在年轻一代学者的努力下继续不断修订重印，郑克鲁和王忠祥、聂珍钊分别主编的《外国文学史》也都出了修订版，它们构成了我国高等院校外国文学史教学的主要教材。

三、外国文学史写作与时代

从 1950 年代末北京大学西语系几位德语文学教师在冯至先生领导下编写《德国文学简史》开始，中国人自主编写外国文学史已经走过了 50 多年的历程。虽然 60 年代初曾经出现了《欧洲文学史》上卷这样质量上乘的文学史著作，但十年“文革”的影响使外国文学史教学和研究遭受严重挫折，真正大规模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材编写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事。从 1950 年代末至今的 50 多年，中国走过了曲折的道路，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国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反映了中国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中国 60 年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材的编

① 《欧洲文学史》编委会《编者的话》，收入刘意青、罗芃主编《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民族出版社，2003 年，第 1 页。

② 详见王守仁《我们时代的欧洲文学史》载《外国文学评论》2001 年第 4 期，第 146—148 页；参见龚翰熊《西方文学研究》第 422—430 页。

写历史就是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史，值得我们认真总结。笔者提出以下几个特点供大家进一步探讨：

第一，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从禁区变为热点。虽然《德国文学简史》一直写到1950年代，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选择，因为编者致力于讲述民主德国的文学发展。而60年代初编写的《欧洲文学史》下限为20世纪初，因为一方面现当代文学还没有受到重视，另一方面学术界也有很多顾虑。“文革”后期开始编写、1980年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前言”说有“现代欧美部分”^①，但1983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则说“本书与《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是姐妹篇”^②，这表明编写“现代欧美部分”的计划已经放弃了。同样，1980年出版的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一册“后记”说“第四册是现代文学”^③，但这套外国文学史只出了三册就停止了。古代和近代的作家早有定评，其在国内外的影响地位也比较容易把握。现当代作家很多还在进行创作或刚刚过世，他们的声誉影响即使在各自国家也尚无定评，国内学者对原著接触有限，自然更难以做出准确判断。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国内虽然对于外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激增，但在文学史写作方面主要还是关注古代和近代作家作品。

但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或许在对当代作家作品进行了大量介绍后学界感觉有了底气，对20世纪文学史的研究因此进入高潮。朱维之领衔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在1990年代的修订主要是增加20世纪文学所占的比重，如1993年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再版后记”写道：“在20世纪欧美文学部分，增加劳伦斯、艾略特、萨特、贝克特、海勒、马尔克斯等节，把文学史的时限延伸到本世纪末。”^④1998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再版说明”强调：“尤其应该提出的是，将第四编中的‘现代’扩充为‘现当代’，其时限延伸至本世纪末，并增加了大江健三郎、韩雪野、西巫拉帕、阿格农、马哈福兹、索因卡、戈迪默等重要作家。”^⑤新编《欧洲文学史》增加

①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第5页。

② 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主编《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页。

③ 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一册，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52页。

④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修订版），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年。本文所引“再版后记”出自2009年出版的第四版，第641页。从1993年修订版开始将“欧美部分”和“亚非部分”改称为“欧美卷”和“亚非卷”。

⑤ 朱维之主编、陶德臻、俞久洪、孟昭毅副主编《外国文学史（亚非卷）》（修订本），南开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页。

了第三卷,介绍20世纪欧洲文学,而且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界,分为上、下两册,其篇幅与前两卷篇幅相差不多。彭克巽教授这样写道:“新编《欧洲文学史》20世纪部分的特色或许在于它继承了我们这套《欧洲文学史》编写的理念,即博采众长,互相沟通。20世纪世界文学逐渐走向多元化,所以我们对从象征主义、表现主义,到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的现代主义潮流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及托马斯·曼等人的20世纪现实主义潮流等等,都做了比较客观的论述。”^①专门的20世纪外国文学史更是层出不穷。最早是张玉书主编的《20世纪欧美文学史》1995年问世,紧接着吴元迈主编的“20世纪国别文学史”丛书,1998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而吴元迈主编的五卷本《20世纪外国文学史》2004年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其他许多出版社也先后推出20世纪外国文学史或国别文学史,可以说20世纪外国文学史是目前最为流行的断代文学史,从出版数量来看完全压倒其他任何断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从1980年代初的无人问津,变为炙手可热,这是值得深思的。^②

第二,无产阶级文学从正统到边缘或消失。《德国文学简史》最后一章叙述民主德国文学,因为那是无产阶级当家做主后的新文学,而对于同期的联邦德国文学则几乎没有涉及。1979年版《欧洲文学史》虽然没有在章节标题上用“无产阶级文学”,但对德国诗人维尔特、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巴黎公社文学和丹麦作家尼克索的介绍都强调他们的无产阶级文学代表特性。1980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分上中下三编,下编包括四章,分别论述“早期欧洲无产阶级文学”、“巴黎公社文学”、“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专门介绍的作家包括维尔特、鲍狄埃、绥拉菲莫维支、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和法捷耶夫等。1986年《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修订版出版时仍保留这种格局,但在下编增加了肖洛霍夫。可能是因为“文革”时对肖洛霍夫批得太狠,“文革”后期开始编写《外国文学简编》时他仍未能得到平反,直到修订版问世他才得以名正言顺地进入。1985年出版的王忠祥等主编三卷本《外国文学教程》在中卷第九章论20世纪文学时以阶级划线的特点仍很明显,先

^① 彭克巽《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关于欧洲文学史编写的回顾》收入刘意青、罗苕主编《当代欧洲文学纵横谈》第5页。

^② 据粗略统计,进入新世纪以来,以《20世纪欧美文学史》为书名的就有汪介之主编的南京师大2003版和蒋承勇等主编的武汉大学2007版;还有李明滨主编的北大2000版《20世纪欧美文学简史》,南海出版社2003年出的谢南斗等编著《20世纪西方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的郑克鲁主编《20世纪外国文学史》上下卷等。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当代世界文学史纲”丛书则论述“二战”以后的主要国家国别文学。

论述无产阶级作家，然后论述有代表性的资产阶级作家，如对法国文学就重点介绍巴比塞和阿拉贡等，对美国文学则先介绍约翰·里德和迈克尔·高尔德等共产党员作家，然后介绍德莱塞和海明威等。但同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在标题中淡化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提法，19世纪德国诗人维尔特则被删除。

从1990年代开始，“无产阶级文学”的提法基本消失了。《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在1994年出的第三版将下编的标题改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主义文学”。此后，不管是朱维之、赵澧主编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还是郑克鲁或王忠祥、聂珍钊主编的《外国文学史》都不在标题上提“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如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第一版下编第二章标题为“20世纪现实主义文学”（下），介绍俄苏现实主义文学，包括的作家有高尔基和肖洛霍夫；2006年出版的修订版这一章的标题则改为“20世纪俄苏文学”，所收作家没有变化。但在第一章“20世纪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中，第一版曾经有专节介绍的萧伯纳和德莱塞这两位带有一定社会主义倾向的作家被删除了。新编《欧洲文学史》20世纪卷则在标题上完全摒弃阶级或流派的标签，只标明不同的国别文学。

第三，从依赖导师语录到关注学术探讨。如前所述，《德国文学简史》之所以能在1950年代末编写出版，最重要的原因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德国人，他们对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早有定评，是编者在那个时代可以依赖的权威观点。1979年版《欧洲文学史》“绪言”只有9页，却有13条革命导师语录引文。看1980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和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两书的“前言”，以革命导师语录为权威表述是个重要特征。《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前言”开头就引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话：“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凡属我们今天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①“前言”一共8页，有五条直接引文，分别是毛泽东语录四条，恩格斯语录一条。同年出版的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一册“前言”共6页，分三个部分，先谈学习外国文学史的作用和意义，再谈学习外国文学史的方法，最后谈本书“东西方文学合一”方式的特点。关于学习外国文学史的意义，先引恩格斯关于巴尔扎克的小说“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的论述，再引列宁

^① 朱维之、赵澧主编《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1页。

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还强调列宁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的“热爱和推崇”。^① 关于外国文学的“艺术借鉴作用”则引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莎士比亚化”和“典型人物”的论述等。^② 这并不表明这些文学史教材的编者没有能力对相关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或论述。这是那个时代的特点，似乎不引用革命导师的话就不符合常规。这种情况在当时出版的国别文学史和外国文学研究论著中司空见惯。

新编《欧洲文学史》“出版说明”指出：“本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一方面继承原《欧洲文学史》材料翔实，不空发论，寓褒贬于叙述之中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排除旧的思维定势的干扰，实事求是地评价文学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按其本来的面貌给予恰当的历史定位。”^③ 虽然没有像初版那样引用革命导师的语录，但坚持唯物史观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总主编李赋宁撰写的“绪言”也没有引用革命导师语录，但在开篇强调“这本文学史试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文学现象，重视文本分析和美学探讨，强调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统一，希望通过寓教于乐使优秀、健康的文学起到教育和感化的作用，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促进我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并紧接着引英国当代小说家艾丽斯·默多克的话“文学是一个不断的故事”和“艺术以艺术为营养”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创作离不开文学传统，文学研究更不能脱离文学传统。研究欧洲文学必须熟悉欧洲文学传统。”^④ 用当代作家的话取代革命导师的话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能被看作是离经叛道，但在今天的文学研究者看来却是很自然的事。在2004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五版，“导言”有4页，两个直接引文分别引自姚斯的《接受美学刍议》和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才能》关注的是文学的特殊性。2009年出版的《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导论”引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的论述：“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群众。”另一条引文出自韦勒克等的《文学理论》用来佐证欧美文学的整体性。^⑤ 刘安武教授的话是很中肯的：“我们是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评价文学现象和作家作品的指导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代替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所以要避免机械

① 详见 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 2 页。

② 详见 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第 3 页。

③ 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出版说明”，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 2 页。

④ 详见李赋宁总主编《欧洲文学史》第一卷“出版说明”，第 1 页。

⑤ 详见朱维之、赵澧、崔宝衡、王立新主编《外国文学史（欧美卷）》（第四版），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 2-3 页。

唯物论、庸俗社会学和贴政治标签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在过去文学评论界是大量存在的。^① 这都表明，经过 30 年改革开放的洗礼，外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已经摆脱了片面依赖革命导师论断的教条主义倾向，转而从文学本身的特性来展开讨论，结合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评述作品的意义。

第四，东方文学的地位出现尴尬变化，有从被刻意突出到重新边缘化的危险。1980 年代《外国文学简编》出版时，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分为两卷，篇幅基本相当（欧美部分 43.9 万，亚非部分 42.1 万），前者主编为朱维之、赵澧，后者主编为朱维之、雷石榆、梁立基。《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主编为朱维之、赵澧，亚非部分主编为朱维之，副主编为陶德臻、陈友书，但是两书的篇幅有了较大变化。《外国文学史（欧美部分）》为 57.9 万字，比简编长约三分之一，而亚非部分为 39.5 万字，比简编反而短了。这种变化带有纠正《外国文学简编》为了片面追求东西方平衡而对内容较多的欧美文学没有充分叙述的偏向。《外国文学史（欧美卷）》后来多次修订，2009 年出版的第四版为 640 页，58.5 万字；《外国文学史（亚非卷）》在 1998 年出版了修订版，500 多页，41 万字，该修订版 10 多年来几乎每年都重印。

在后来出版的其他外国文学史著作中，东方文学所占比例则有了明显变化。郑克鲁在谈编写《外国文学史》的指导思想时批评说：“以往有的文学史更给予亚非文学以非常突出的地位，其篇幅甚至与欧美文学相当。我们认为这并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欧美文学取得的成就无疑要大于亚非文学，这是客观事实。亚非各国由于历史和社会方面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文学得不到充分发展，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新教材给予亚非文学以五分之一左右的篇幅是合理的，决不会将优秀的亚非作家和作品排斥在外。”^② 在郑克鲁主编的两卷本《外国文学史》中，欧美文学分上中下三编，上卷 45 万字，为欧美文学上编和中编，下卷 37 万字，为欧美文学下编（1—175 页）和亚非文学（第 179—306 页）。^③ 王忠祥和聂珍钊主编的四卷本《外国文学史》则以欧美文学为经，以亚非文学为纬，即在各章第一节概述各个时代的世界文学，然后具体论述欧美文学的发展。王忠祥执笔的“绪论”指出：“即使以欧美文学为经线主体，以亚非文学为纬线参照系，进行经纬交织、历时共时结合的东西方文学的呼应比较，也不会陷入‘欧洲中心

① 刘安武《编写〈东方文学史〉的几点思考》收入李明滨、陈东主编《文学史重构与名著重读》第 24 页。

② 郑克鲁《〈外国文学史〉的编写现状及设想》，载《文艺理论研究》1995 年第 1 期，第 78—79 页。

③ 详见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年。

论’的泥潭。”^①但是，阅读这部《外国文学史》给人的印象却是亚非文学仿佛成了点缀，欧美文学才是世界文学的正统。这种做法是否有矫枉过正之嫌的确是值得讨论的。

我们还可以从几部篇幅较短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看这种变化。陶德臻主编的《外国文学史纲》于1989年底完成，1990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②该书的特点是把东西方文学合为一卷，而且先叙述东方文学，再叙述西方文学。从篇幅来看，全书560多页，第一编标题为“东方文学”，共5章210多页，下限为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尼日利亚作家索因卡；第二编标题为“欧美文学”，共7章350多页，东西方文学比例大约是2比3，反映了那个时代重视东方文学的特点。该书的一个突出弱点是第二编“欧美文学”没有包括拉美文学，只涉及欧美主要国家文学。考虑到拉美文学在20世纪的爆炸性发展，这种忽略显然是不应该的。另外，欧美文学下限为20世纪中期的萨特、卡夫卡和海明威等，这与亚非文学包括了80年代的成名作家相比也不协调，这可能是因为在篇幅上要顾及东西方文学的比例而造成的缺陷。郑克鲁主编的《外国文学简史》则恰恰相反，有点过于重西方轻东方。虽然欧美文学和亚非文学都分上中下三编，但欧美文学占355页，亚非文学占56页，不到全书的七分之一；蒋承勇主编的《世界文学史纲》2000年版有460页，亚非占83页，不到五分之一，而在2008年出的第三版中，亚非文学所占篇幅不足六分之一。^③1980年代出版的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采用按照时间顺序把东西方文学一起讲述的方式有其特点，因为东方文学，特别是中东地区埃及和希伯来文学的发展，比古希腊文学要早，对欧洲文学有重要影响，结合在一起做历时叙述比较容易讲明两者的关系。但遗憾的是现在这种讲述方式已经被外国文学史编者放弃了。笔者认为，即使作为不同叙述方式、写作方法的探索，也应该鼓励这种先东方后西方或东西方文学按时间顺序合并叙述的外国文学史保持一席之地。

外国文学史教材编写或者说外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国社会文化的变化紧密相连。50年代末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60年代初编写的《欧洲文学史》和

① 王忠祥、聂珍钊主编《外国文学史》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② 该书的主编陶德臻和何乃英、张朝柯、易漱泉等多位编者都是24院校编《外国文学史》的参编者。

③ 详见郑克鲁主编《外国文学简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蒋承勇主编《世界文学史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版2008年。

《外国文学史讲义 欧美部分》受苏联模式影响，强调唯物主义反映论，重视阶级斗争在文学作品中的反映，对于作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关注不够，而这种偏差在“文革”中编写的《外国文学简编》试用本中更是走向了极端。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观念还比较陈旧，“文革”的影响或“左”的束缚仍很严重，反映在文学史研究和教材的编写上就是政治挂帅，以革命导师的论断为权威，而在外国文学史的介绍中把重点放在早有定评的古典作家，特别是现实主义作家，对于现当代作家则尽量回避。在东西方文学的比例方面则刻意强调平衡，以打破西方中心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新一代学人已经成长起来。外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抛弃了过去的左倾路线，转而探讨重要作家的艺术成就和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虽然在评价文学作品时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本原则，但已经很少有人依赖革命导师的言语来做判断、下结论，更关注对具体作品的赏析。对于过去被简单否定的现代派，人们也能够给予比较公正的对待，实事求是地肯定其在文学史上的贡献。在东西方文学之间刻意搞平衡的倾向已经得到纠正。但是，我们似乎也应对一些现象保持某种警觉：在注重当代文学阅读赏析的时候，是否也有忽视经典的危险？在抛弃了庸俗社会学对作家和作品的片面解读之后，是否也忽略了文学的社会批判作用和教育意义？在纠正了刻意追求东西方平衡的偏颇之后，是否又有意或无意地被西方中心论蒙蔽了眼睛，自觉或不自觉地轻视东方文学呢？^①

[作者简介] 韩加明，男，1956年生，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英语系教授。近年出版专著《菲尔 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发表论文《〈诺顿英国文学选集〉版本演变述评》（载《外国文学动态》2009年第2期）、《从容对死亡 风趣说人生——读菲尔 瓊作〈里斯本海行日记〉》（载《英美文学研究论丛》第11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9年）。

责任编辑：杨卫东

^① 当然这种担忧也可能是不必要的，虽然1999年出版的两部《外国文学史》对东方文学似乎重视不够，但1980年代就开始出版的以东西方文学并重为特点的《外国文学简编》和《外国文学史》仍然在不断修订。梁立基、何乃英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亚非部分）》第四版篇幅（58.2万）甚至超过2004年出版的《外国文学简编（欧美部分）》第五版（50.8万），而且还有大量的《东方文学史》专著相继问世。